

# 存在、伦理、身份

## ——论菲利普·罗斯创作中的身体叙事

李俊宇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 352100)

**摘要:**纵观菲利普·罗斯一生的创作,他对身体叙事十分重视,许多作品都是身体叙事的典范之作。性爱叙事、衰老叙事、疾病叙事和死亡叙事是罗斯身体叙事的四个主要方面。从这四大基石出发探讨存在、伦理、身份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可以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罗斯的创作。罗斯通过身体叙事,抒发了存在主义意义上对个体存在的关怀与悲悯,展现了一种现代自由伦理,书写了现代人所遭受的身份困境及如何重建身份主体。罗斯的身体叙事受卡夫卡、弗洛伊德等的影响,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也是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和艺术上求真的表征。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身体叙事,性爱,疾病,衰老,死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5)06-0056-06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5.06.011

### 1. 引言

菲利普·罗斯在《垂死的肉身》开篇引用了埃德纳·奥勃兰恩的一句话: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和头脑一样多。这体现了罗斯对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的重视。对身体的关注与描写,在罗斯的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他的几部作品如《波特诺的抱怨》(1967)、《乳房》(1972)、《解剖课》(1983)、《遗产》(1990)、《垂死的肉身》(2001)、《普通人》(2006)等都是身体叙事的经典之作。

在身体叙事中,身体的故事由身体的感受所引发出来,包括身体的欲望、病痛、衰老和死亡等。身体成为了叙事的原点,叙事发动的引擎。在笛卡尔倡导的理性时代,尽管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其“我思,故我在”表明身体与理性意识相比,身体处于从属地位。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尼采基于身体的美学思想将身体地位予以极大提升,突出了“我在”的重要性。在尼采哲学理论的影响下,梅洛-庞蒂以身体为基石建立起他的现象学理论,并在身体层面上冲破了二元论的束缚,实现了身体与心灵的统一。身体叙事成为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潮流,也成了文学评论的热门话题。国内学者谢有顺(2003:30)认为,“如果作家的写作省略了肉体 and 欲望这一中介,而直奔所谓的文化意义,那这具身体一定是知识和社

会学的躯干,而不会是感官和生命的,这样的作品也就不具有真实的力量”。然而,如果只赤裸裸地表现身体的感官欲望,进行所谓的“身体写作”,那文学创作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与意义。笔者认为,身体叙事与单纯的“身体写作”不同,它不仅关注人的原初欲望与情感,而且思考个人的欲望与自身及社会的伦理冲突,探究人存在的深层意义。对于身体叙事,许德金和王莲香(2008:33)主张将身体叙事与身份问题联系起来探讨,“应该从人物身体与多重身份的交汇点出发,关注人物由于不同身份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而国内外的身体叙事都忽略了作者本人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在进行文本的叙事分析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真实作者的肉体存在”(同上:30)。由上观之,在探讨身体叙事时,完全可以与存在、伦理、身份以及作者本人的身体状况等联系起来。

纵观罗斯创作,其作品主人公从年青到衰老及至死亡,构成了一条生命之线。沿着这条线,罗斯描写了主人公年青时的性爱冒险历程,年老时的疾病和衰老的困扰,最后到面临死亡时的恐惧。性爱、衰老、疾病、死亡是罗斯身体叙事的四个重要方面。因此,罗斯的身体叙事由性爱叙事、疾病叙事、衰老叙事和死亡叙事组成。本文基于这几方面来阐述罗斯身体叙事的存在关怀、自由伦理和身份困惑,力图揭示其身体叙事的特点及目的。

### 2. 罗斯身体叙事中的存在关怀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之存在成为许多先哲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股强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并非在于为这个

**作者简介:**李俊宇,宁德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叙事学。电子邮箱:junyuli1998@163.com

\* 本文受到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 A 类项目“地方本科院校英美文学教学意义及策略研究”(编号 JA13339S)及宁德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英美文学与中外文化传播”(编号 2013T09)的资助。

社会和其中的个人制定任何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并非在于引导人们如何去行动、去思考，而是在于揭示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孤独、恐惧、虚空、迷茫和无望。在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创作相互贯通、交融，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如萨特、加缪等常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们对人之存在的体认与关怀。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是个人的存在(being)。从词源学上看，being 强调一种“现时性”、“在场性”与“行动性”，being 与 human 合起来构成了具有完整意义的“人”(human being)。“现时”与“在场”是人身体的在场，而“行动”首先是身体的行动，体现着人的能动本质。而尼采等人则将身体作为存在与超越的出发点，因此，正如杨经建(2009:116)所言，“以‘身体’话语为标志的非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转向的标志，这种转向更多的是由存在主义完成的”。因此，现代文学的身体叙事往往体现出存在主义的内涵，是对人之存在的深切关怀，以萨特、加缪、卡夫卡和昆德拉的创作为代表，罗斯的许多作品也位列其中。在其身体叙事作品中，罗斯主要通过描写身体的欲望、感受和情感，来实现对“我在”的关怀与悲悯。

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1988:13)曾感叹道，“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孑然前行”。性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因为直接与身体相关，因此性爱叙事是一种地道的身体叙事。《波特诺的抱怨》是一部性爱叙事作品，兼有疾病叙事。主要叙述少年与青年时期的波特诺的性爱冒险经历。少年的他沉湎于手淫而不能自拔，并患上神经官能症；青年的他为克服内心深处作为犹太人的强烈自卑感而四处寻找非犹太女子为性伙伴，以迫使对方与他发生各种性行为而获得一种征服感。手淫与性关系都是性行为，前者以自身身体、后者以他人身体为性发泄对象。罗斯通过叙述波特诺的性爱经历，展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性成为了一种反抗与征服的武器。波特诺歇斯底里的自白里充满了焦虑、不安和恐惧，他的神经症表明了现代社会个体心态的压抑与扭曲。《乳房》与《解剖课》是疾病叙事之作，在《乳房》中，主人公凯普什变成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滑稽可笑的乳房。罗斯在这里使用狂欢化的戏谑手法。在戏谑的背后，罗斯对人存在之关怀却是严肃而认真的，正好体现了他的“彻底的戏谑，致命的认真”。在《乳房》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凯普什在变异前后的恐惧、痛苦和尴尬，对身份模糊、丢失时的纠结、彷徨和苦闷。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恐惧”这样的词或近似意义的表达。凯普什的变异是人未老却性欲衰退的结果，是精神疾病的外在表征，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它体现了罗斯对人类命运的担忧：现代人终将陷入是人而又非人的境

地。《解剖课》以身体的疼痛、对疼痛的医治来展开叙事，小说中充满了大量医学术语。作家祖克曼遭受着身体病痛的折磨，寻医治病替代写作成了生活的主旋律。然而，寻遍各类“名医”却仍然无法治愈病痛。除颈椎和臂膀无法去除的疼痛外，长期的脑力劳动，使得脱发也成了祖克曼的难言之痛。祖克曼是罗斯的“另一自我”，罗斯照片中光秃秃的头顶表明他很可能遭受过脱发的痛苦。弗兰克(Frank 2013:170)认为，“所有的疾病叙事都源于人类生存状态中普遍存在的痛苦感受”。难能可贵的是，罗斯让我们见识了长期伏案写作的作家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在罗斯笔下，精神的痛苦与身体痛苦是紧密相连的，他很少单独表现精神的痛苦而不叙述身体痛苦。其原因在于罗斯不相信宗教所言的“身心分离”，在他看来，精神与肉身共在。在现代社会，持此观点的不只罗斯一人，“在本[即 20]世纪，‘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梅洛-庞蒂 2005:284)。《垂死的肉身》融性爱叙事与衰老叙事于一体，已步入老年的名教授大卫·凯普什与他年轻的学生康秀拉·卡斯底洛发生了一段凄美的恋情。他被康秀拉充满青春活力的、性感的身体所吸引，欲罢不能，“在我，则是又一次知道了色欲的愚蠢令人欢愉”(罗斯 2004:17)。凯普什在与康秀拉的恋情中，尽情地享受了性的快乐。在这部小说中，罗斯肯定了人身体中基本的欲望——性欲，以及性欲下的冲动，“我感兴趣的绝不是法国式的调情艺术，而是野性的冲动”(同上:19)。《普通人》则是一部衰老与死亡叙事之书，衰天气息随处可见、死亡事例随处可见。在死亡面前，作为“普通人”的“他”感到孤独、空虚、焦虑与恐惧。罗斯将作品命名为“普通人”(或“凡人”)，主人公没有确切的名字，意在表明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其他所有普通之人身上。“在大部分小说中，‘自然死亡’式的善终往往被轻描淡写地忽视过去，作家似乎更愿意去呈现那非正常的死亡方式”(邓天中 2013:39)，但罗斯却着力去描写自然死亡，展示人们在死亡面前的心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罗斯的作品中，性爱叙事、衰老叙事、疾病叙事和死亡叙事常常交织在一起，“老年、衰老在文学作品中从来也不可能离开对‘性’的讨论”(同上:8)。罗斯的身体叙事，充分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与本真状态。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相比，他并不描写可歌可泣的爱情、也不用道德的标尺来审视其笔下人物。而且绝大多数主人公抛弃了宗教信仰，如《普通人》中的“普通人”和他的兄弟。没有了宗教及其终极关怀，身体成为唯一存在，“这儿只有我们的身体，注定活过一段时期然后

死去,这都是由那些在我们之前活过、然后又死去的身体所决定的”(Roth 2006:51)。在这里,罗斯强调身体的自然属性。刘小枫(2004:136)认为,“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呢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在《垂死的肉身》中,康秀拉原本有一对引以自傲的、诱人的乳房,但却被癌症这个病魔无情夺走,真是造化弄人。为了能有效抱慰个人情感,罗斯在叙事手法上别出心裁,如尽可能缩短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也尽可能拉近作者、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及人物与读者的距离,让你感觉到似乎是你的身体在爱、在痛、在遭受疾病的折磨、在亲历死亡。这,也许就是罗斯在身体叙事上的最大成功。如在其祖克曼系列小说中,祖克曼是作家,也是罗斯的第二自我,这样一来,就拉近了作者与人物的距离,有如作者本人在诉说他的欲望、欢乐与痛苦。又如,以罗斯命名人物的小说,如《遗产》和《夏洛克在行动》,则模糊了小说与传记的界限,缩短了它们之间的距离,达到了既有生动性,又有真实性的效果。再如,以“人人/普通人”(Everyman)命名的小说《普通人》,则大大缩短了读者与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距离,因为 Everyman 既可以指你,也可以指我或他,包括罗斯本人。从血气方刚的青年波特诺,到疾病缠身垂垂老矣的“普通人”,罗斯与其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同步衰老。

总之,罗斯“我在”的身体叙事,主要描写个体的欲望、感受和情感,旨在真实反映个体在这个悖论性社会中的欢乐、痛苦、孤独、空虚和恐惧;旨在抱慰个人的情感。罗斯的身体叙事是对个体存在的关怀,也是一种沉重的悲悯与哀悼。塞菲尔(Safer 2004:144)认为,“与罗斯对康秀拉的哀悼并行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哀悼”。但笔者认为,罗斯重点不是要哀悼这个迷失的世界和社会,而是哀悼迷失于其中的个体。在现代社会,这些充满欲望的肉身个体是多么脆弱与乏力。他们无力反抗这个文化语境,只能在痛苦中舔舐自己的伤口,发出阵阵呻吟之声。值得注意的是,在《波特诺的抱怨》与《乳房》中,都有一位医生,尽管他言之甚少,但与波特诺之间展开了伤痛叙事。众所周知,医生的主要责任是治病救人。那么,作为身体叙事一种的伤痛叙事有没有治愈作用?从罗斯的《解剖课》中发现,医生都不能治愈病人,伤痛叙事就更加乏力了。然而,这种对“伤疤”的抚摩性叙事,却能带来身心健康。正如瓦特金(Watkin 2004:152)所言,“哀悼是艺术,是审美过程,以健康

作为回报”。文学作品中的伤痛叙事,莫不如此。

### 3. 罗斯身体叙事中的现代自由伦理

罗斯身体叙事中的伦理叙事包括伦理展示与伦理思考,同样体现在他的四类叙事中。伦理思考通过两种路径得以实现,一种是文本中叙述者的直接内心独白,就是叙述者时不时插入独白式的议论,这种议论,不是道德式的阐释或责难,而是对命运的哀叹,对自身存在的思索;另一种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刻画来展开伦理思考,作者的伦理观通过整个文本来体现。罗斯往往从伦理层面来观察、思考与他人、社会及自我之间的关系,其身体叙事体现出一种现代自由伦理。伦理是指客观的关系和秩序,强调“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怎样”,“道德是主观的,伦理是客观的;伦理更关注的是和谐,而道德更强调规范”(倪素襄 2007:17-18)。在历史上,康德、笛卡尔的伦理强调理性的作用,斯宾诺莎坚持的是道德工具论,他肯定了欲望是人的本质,但强调应该用理性去指导生活。依此观点,罗斯作品中的波特诺、凯普什、“普通人”都是非理性的,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现代伦理不仅要关照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而且要关照个人本身的情感与欲望的关系。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探讨了什么是现代性伦理以及现代小说和电影如何表现这种伦理,他(2004:240)指出,“如果撇开伦理国家的道德秩序,只是设想个人的道德处境,伦理问题就是个体人,与一个复杂、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性情关系问题”。那么什么是性情问题?“所谓性情,主要指人的自由意志,在现代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个体人的欲望”(同上:248)。可见,个人与自身欲望/自由意志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方面。他接着阐述了自由伦理观,“自由主义伦理观要求个人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不可推给道德规戒”(同上:265)。在《垂死的肉身》中,罗斯表达了相似的伦理观,“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只要你的行为合法,制度根本不在乎你干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通常都是自找的”(罗斯 2004:89)。可见,罗斯与刘小枫在自由伦理观上的共同点是:在自由社会,个体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也必须自己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刘小枫主要论述基于身体的自由伦理,他认为,“自由伦理的身体原则,意味着不同身体感觉的不平等权利,意味着承认只把身体当做身体来享用(而不是我‘为了……’)的原则”(刘小枫 2004:85)。罗斯对性爱的描写,不像许多女权主义作家所做的那样动辄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垂死的肉身》中,性爱就是性爱;在《普通人》中,“死亡就是死亡,此外别无其他”(Roth 2006:119)。但当罗斯的创作视野从个人转向社会后,他看到了

社会尤其是社会意识形态对实现身体自由伦理的限制,如在《人性的污点》中,主人公希尔克希望自由地改变自己的身份却最后身败名裂,自由地追求性爱却最后死于非命,身体也随之灰飞烟灭。究其实,罗斯的自由伦理观也是一种现代个人自由伦理观。现代个人自由伦理从身体出发,不仅关涉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还包括个人内部情感、欲望与意志的关系。具体而言,一是情感、欲望与疾病、衰老、死亡之间的关系,即生命张力与生命阈限之间的关系;二是生命张力驱动下的自由意志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在身体叙事作品中,罗斯认真考察了这些伦理关系并展示了伦理冲突。

在《垂死的肉身》中,罗斯思考了性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性”只能暂时性地克服死亡的恐惧。“性还是对死亡的报复。别忘了死亡。千万别忘了它。是的,性也受制于死亡的力量”(罗斯 2004: 76)。在性爱的极乐之神旁边往往蹲伏着一个死亡的魔鬼,正对人的这具充满欲望的肉身虎视眈眈。在《垂死的肉身》中,凯普什身体上的衰老,预示着他在性上失去了优势;在《普通人》中,作者对老年及与老年有关的死亡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衰老伴随着性功能的衰退,而罗斯一直认为,性力是一个人信心的来源。《普通人》中老年的“他”在性心理上仍有强烈的冲动,但身体已失去性的吸引力。因此,身体的衰老与性心理之间构成了一种伦理冲突。这是一种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在《解剖课》中,祖克曼因背疼痛到近乎崩溃的地步,“我面朝街道,身体探出屋顶,对‘疼痛’说:‘你再痛我一分钟,我就跳下去。’我要把你从我身体里吓出去”(Roth 1983: 109)。在这里,祖克曼对自己说话,将疼痛看作一个另一个自我,构成了一种伦理关系。

性作为一种生命张力,不仅与生命阈限有关,而且与他人有关,性吸引本身就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罗斯的性爱叙事中体现出他彻底的性自由观,他认为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伴侣。在美国许多高校,禁止师生之间发生性关系,但罗斯在《事实》和《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表现出反对这一规定的立场。众所周知,师生之间具有一种天然伦理关系,而师生恋中包含一种性伦理关系,这两种伦理之间能否并行存在?从罗斯的作品看,他的性自由伦理与此并不相悖。但同时,通过罗斯的自传性作品《事实》和虚构性作品《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发现,罗斯在性上的自由是屈从于个人事业追求的,当性伴侣的存在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作家的创作时,男性会最终彻底抛弃女性,摆脱羁绊。因此,这种性上的自由又是不自由的。罗斯的这种性观点与卡夫卡很类似。在《垂死的肉身》中,罗斯通过性爱

描写探讨了与之相关的衰老、死亡的主题,也对流行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进行了反思。可以看出,尽管罗斯反对性的压抑与束缚,但他并不一味地为这种反传统的过激行为叫好,他(2004: 69)认为,“这只是一场幼稚的、荒谬的、失去控制的、激烈的闹剧,整个社会陷入一场巨大的喧闹之中”。显然,美国社会六十年代的这场运动是一种性伦理的失控。但罗斯(同上:70)看到“其影响却是革命性的。从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罗斯将其肯定为一场革命。在这场性伦理革命中,年轻的一代冲破了旧制度与传统的束缚,做了他们想做的事。

在疾病叙事中,罗斯还思考了患者和医生的伦理关系。伤痛叙事是疾病叙事的一种,弗兰克(Frank 2013:20)认为,“在伤痛叙事中,主体的言说行为变成了一种伦理行为”。在罗斯的《乳房》和《波特诺的抱怨》中,伤痛叙事有一个听者——医生,这样医患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伦理关系。在基督教意识形态下,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他的存在之思,是对自身与上帝关系的思考,更多地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但罗斯不是基督徒,而且一向厌恶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对人身心的束缚,与其自由伦理观背道而驰。“在小说《垂死的肉身》中,我们看到了罗斯思想的斗争,他在思考宗教和人的关系”(曲佩慧 2013:154)。究其实,罗斯对宗教和人的关系之思考,就是对人的肉身和宗教的关系之思考。在《普通人》中,罗斯再一次思考人与宗教的关系。罗斯似乎频频回眸被其抛弃的宗教,然而,他又一扭头狠心孑然前行。在“上帝已死”的现代社会,何止罗斯一人对宗教持这样的态度呢?随着创作视野的扩大,罗斯在身体叙事中逐渐转向了社会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的思索。中年以后的罗斯,表现为一种回顾性“我思”,尤其体现在他的《事实》、《我作为男人的一生》等作品中;进入晚年的罗斯,“我思”成为其创作的主旋律,以《普通人》转折点,在这部作品中,罗斯对性爱、疾病、衰老、死亡、家庭、宗教、社区生活等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在《愤怒》中,罗斯思考了战争对个人生活、家庭幸福的影响,并表明战争作为一种绞杀肉体的机器,直接毁灭了人的身体及存在本身。

总之,罗斯身体叙事中的“我思”包括思考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弗兰克(Frank 2013:2)所言,“身体化叙事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一是社会的”。罗斯前期创作中,“我思”的重点是人与自身,后期则是人与社会,都体现出一种自由伦理之思。罗斯将其“我思”置于自身生命的周期发展中、历史文化语境中,并且与其身份紧密相连。身体自由是罗斯自由伦理观的核心。然而,疾病、衰老、战争、意识形态等严重削弱了这种最基本

的自由。在现代社会,人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自由。生命张力与生命阈限之间、自由意志与外在伦理、道德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建立完全自由、和谐的伦理关系只能是美好的乌托邦。罗斯本人莫不如此。罗斯在年轻时,率性而为,在作品中毫无顾忌地描写性爱,被戏称为“喜欢写性爱的家伙”;大胆揭示犹太人本身的“瑕疵”,遭到了犹太社会强烈的谴责与攻击,被称为犹太人的“逆子”;在婚姻和性生活上追求自由,却被前妻称为“玩弄女性”的作家。

#### 4. 罗斯身体叙事中的身份困境书写

身体与身份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拉康镜像理论中的身份认同就是建立在身体基础之上,而且,拉康借助主体这个概念将身体与身份联结起来。主体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语境中,主体是意识的主体。到梅洛-庞蒂时,主体依赖于身体。到了尼采那里,身体变成了主体的基本构成体。可以说,主体经历了从意识到身体的归化过程。罗斯笔下的主体是身体的主体,是受身体所决定的主体,不是身体的主宰。拉康(2001:9)又指出,主体是“一个人文世界里的文化性存在”。也就是说,主体是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因此,“身体与自我在文化意义上交织在一起”(Frank 2013:170)。可见,身份随着身体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身份的具体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在后现代时期,身份包括我们的承诺、责任,我们的灾难、尊严”(同上:20)。有时由于文化的撞击,身份会遭到破损。因此,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总是在不断进行之中。譬如,两性之间的行为、疾病和衰老也会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正如苏珊·桑塔格(2003:5)所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病和衰老会让一个人由强者身份变成弱者身份,尤其是那些因为衰老和疾病而无法自理的人。在《遗产》中,罗斯父亲因为癌症而不能自理,被迫依赖儿子菲利普“像妈妈对儿子般”地照顾自己,父亲的身份出现了危机,因此父亲提醒菲利普,不要将自己大便失禁的事告诉家人。这一“指令”是试图恢复自己的父亲身份。在年老后,男人的性力逐渐衰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性别意识也减弱了,女性身份与男性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变得模糊起来,出现身份认同的困难。

在身份问题上,主体往往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身份的规约和身份的模糊及丢失,会通过行动如改变身体或利用语言来对抗文化语境。譬如在非洲,一些妇女(如空姐)通过漂白黑肤色来模糊自己的身份。又如,在《波特诺的抱怨》中,波特诺追求异性并强迫异性与之发生变态性行为,其实质是

文化语境和犹太文化语境对犹太男子的“阉割”,重获男子汉气概,建立男子汉身份。国内研究者曲佩慧指出,罗斯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通过身体的改变来对抗身份的规约。在《人性的污点》中,主人公希尔克恰恰利用浅肤色来改变自己的黑人身份。但在美国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这一“僭越”行为又最终导致他陷入死亡境地。笔者认为,在论述身份认同时,不能忽视语言的作用。在传统观点看来,语言是实现身份认同或建构的工具。而在现代哲学看来,语言与作家的身体自然地融为一体,“目前,语言和作家融为一体,语言是作家本人。语言不再是意义的仆人,而是表达活动本身,会说话的人或作家不必像普通人预先考虑其行为的细节和方式那样有意识地支配语言”(梅洛-庞蒂 2005:291)。会说话的人或作家之所以能这样自然地使用语言,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基于身体意识,是一种广义上的身体叙事。从生理上说,语言是身体的行为,与嘴巴、手、大脑这些人体器官直接相连。拉康将语言引入主体性建构之中,语言成为主体性得以维持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决定主体性的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维系主体之间关系的最主要活动当然是主体间的指称事物传递意义的活动。这就是说,语言的使用是主体间性的本质所在”(拉康 2001:10)。“主体本身也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关系所构成的,主体性因为被认为只是社会和语言的构建物”(同上:23)。可见,主体性在于主体间性,语言的使用决定了主体性的实现。

在罗斯的作品中,当人物因身份模糊或身份失去而迷茫、痛苦时,往往通过语言来试图重构自身身份。只要人物还没有失去说话的能力,那么他就有可能恢复其身份。在《乳房》中,尽管凯普什已经由一个具有四肢的人变成了一个椭圆状的乳房,但作者并没有让他消声。作者“剥离”了凯普什的“人状”,却没有“剥夺”其行使语言的权利。相比而言,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几乎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在《乳房》中,凯普什的变异模糊了人与非人、男人与女人的界限,他试图通过语言来实现主体性的建立与维持。在《波特诺的抱怨》中,波特诺近乎独白式的喊叫和唠叨是一种对主体的宣示,并试图重建受损的主体身份。从拉康的主体理论来看,波特诺是不成熟的,或处在成熟的途中。在评价罗斯的早期作品,如《乳房》、《波特诺的抱怨》时,米歇尔(Michel 2008:232)认为,“如果说罗斯将神经崩溃和其他精神紊乱看作人类,尤其是当代美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的、不可逃避的命运时,但不同于塞林格,罗斯并不相信在精神上有救治性道德或神秘主义;那么,在表明这一切都是无用时,他也不可能退回到长时间的沉默之中”。可见,罗斯对凯普什和波特诺这一类人的命运并非漠不关心,听之任之,而是让他

们通过语言来表达痛苦、试图重建其受损乃至破碎的身份。在《普通人》中,疾病与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使主体成为一个地道的他者。而他者的身份是对主体的疏离,极大地影响了主体身份的建构。如前所述,主体身份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在疾病和死亡恐惧的双重打击下,主体处于不稳定状态。

罗斯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地道的“我言”。通过“我言”罗斯建构了自己的身份。罗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是一个犹太人,有着犹太人高鼻梁的身体特征,他在《再见了,哥伦布》、《波特诺的抱怨》中都提及了“鼻子”,可见罗斯对此区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身体特征很在意,在许多场合,他都极不愿意别人称他为犹太作家。称号作为语言行为,会形成、固化身份。然而,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犹太家庭中。罗斯的创作行为自然而然地塑造了他作为美国犹太作家的身份,而且罗斯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他把个人经历通过想象加工编织进了作品之中,而“个人自身经历的发表能够形成一种身份,并会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Frank 2013:69)。可以说,罗斯创作《事实》这部自传性作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构自己的身份,同时驳斥别人对他的指责。因为《再见了,哥伦布》、《波特诺的抱怨》等小说,罗斯被认为患了“厌女症”,且是个“反犹太主义者”。

## 5. 结语

罗斯的身体叙事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个体存在的关怀与悲悯,体现出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现代伦理观,书写了现代人所遭受的身份困境。存在、伦理、身份相互关联,在身体叙事中,它们的主体源于人的身体本身。伦理和谐或冲突、身份明朗或困惑,是人之存在的状态。伦理与身份也密切相关,文学伦理学就有“伦理身份”的说法。对于罗斯而言,存在的关注是第一位的。相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罗斯是“我在,故我思,故我言”。从对身体和存在的重视及个人自由伦理观来说,罗斯与昆德拉这两位文学好友有许多相同之处,昆德拉(2012:47)曾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然而,罗斯更关注现实中人的存在。罗斯的身体叙事深受卡夫卡、弗洛伊德等的影响,也受二十世纪“身体转向”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菲利普·罗斯与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从年轻走向衰老,并见证了死亡,也遭受过精神与身体疾病的折磨,“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遭受过精神的崩溃,花了多年时间进行诊治”(Parrish 2007:4)。由于感同身受,他将自身的经历编织进作品之

中,通过身体叙事,表达了个体的欢乐、痛苦、迷茫、恐惧;通过语言的诉说,实现了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净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创作,他确立了自身的身份。

语言是存在的家,叙述是意义之所,而身体叙事,恰恰为现代人找到了一个贴近身体的家。莎士比亚曾借其剧中人物麦克白之口叹道:人生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什么意义都没有。然而,言说与创作却能在这无意义中找到意义,“利用一套完整的符号将与自己的生活平行的意义层面叙述出来,叙述出自己生活的质感,从而告诉自己活过”(邓天中 2013:217)。罗斯的身体叙事就是利用语言这套完整的符号来刻画生命的本真状态,并让生命从焦虑、恐惧状态中走出来,且力图获得完满的身份。

## 参考文献

- Frank, A. W. 2013.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chel, P. 2008. What price misanthropy? Philip Roth's fiction [J]. *English Studies* (3): 232-39.
- Parrish, T. 2007. Introduction: Roth at mid-career [A]. In T. Parris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 Roth, P. 2006. *Everyma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oth, P. 1983. *The Anatomy Lesson*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 Safer, E. B. 2006. *Mocking the Age: The Later Novels of Philip Roth* [M]. Albany: State of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atkin, W. 2004. *On Mourn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邓天中. 2013. 当代英语小说中老年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菲利普·罗斯. 2004. 垂死的肉身(吴其尧译)[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 拉康. 2001. 拉康选集(诸孝泉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刘小枫. 2004. 沉重的肉身[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米兰·昆德拉. 2012. 小说的艺术(董强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莫里斯·梅洛-庞蒂. 2005. 符号(姜志辉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倪素襄. 2007. 伦理学简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曲佩慧. 2013. 用身体来书写身份——罗斯小说中的身体写作研究[J]. *文艺争鸣*(2): 153-60.
- 叔本华. 1988. 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叔本华随笔(李小兵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苏珊·桑塔格. 2003. 疾病的隐喻(程薇译)[J].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谢有顺. 2003. 身体修辞[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 许德金、王莲香. 2008. 身体、身份与叙事——身体叙事学刍议[J]. *江西社会科学*(4): 30-33.
- 杨经建. 2009. “身体叙事”: 一种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症候[J]. *文学评论*(2): 116-20.

(责任编辑 玄 琰)